

# 从目的论视角解读林语堂英译《论语》中的“叛逆”现象

王晨婕

(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采用描述翻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分析林语堂编译《论语》过程中导致在篇章结构和内容方面“叛逆”现象的翻译策略,继而运用翻译目的论揭示“叛逆”现象背后的因素。林语堂在英译《论语》过程中采取编译的形式——重排原文篇章结构和增删内容——是基于一定的翻译目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向西方社会通俗地介绍儒家思想的精髓和塑造孔子文化形象。研究的启示在于:文学翻译中的“叛逆”现象可以从翻译目的论角度给予合理解释,译者对原文的“叛逆”是实现其翻译目的的选择,而评价译文的标准则是看其是否有效实现翻译的目的。

[关键词]《论语》;目的论;编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8)01-0134-04

## 一、研究的缘起

学贯中西,并以“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作为座右铭的一代文豪林语堂先生曾译介了一系列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和传统典籍,例如以全译的形式译介清代沈复自传小说《浮生六记》,以编译的形式译介了《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中国古典哲学类著作,成功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对林语堂研究的深入,其作为翻译家的研究也日益受到了学者专家的关注,特别对其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是翻译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而就译本研究方面,以对《浮生六记》等全译本的研究居多,这些研究大多关注文化差异的可译性、翻译文本的语言分析和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而对于林语堂翻译生涯中颇为重要的贡献——将诸多中国经典文化形象通俗化地译介到西方——鲜有提及。《论语》作为我国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历史上曾有很多学者将其译介到世界各国。林语堂则是采取了编译的形式将其英译到西方社会,以此传播中国文化。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在分析林语堂编译《论语》时所采取特殊翻译策略的基础上,运用翻译目的论对译本的“叛逆”现象予以合理解释,同时揭示“不忠”现象背后的因素。

## 二、林语堂编译《论语》策略分析

首先必须澄清的是,林所英译的《论语》是其所编译的《孔子的智慧》中的第五章。为了更好地解读林在编译《论语》中的策略,有必要概述 The Wisdom of Confucius(《孔子的智慧》)的内容编排。

表一

Chapter I	Introduction (导言)
Chapter II	The Life of Confucius (by Szema Ch'ien) (孔子传[依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英译])
Chapter III	Central Harmony (《中庸》)
Chapter IV	Ethics and Politics (《大学》[依宋儒朱熹改编本英译])
Chapter V	Aphorisms of Confucius (《论语》[依《论语》编译])
Chapter VI	First discourse: Education through The Six Classics (《论以六艺施教》[依《礼记》第二十六《经解》英译])
Chapter VII	Second Discourse: An Interview with Duke Ai (《哀公问》[依《礼记》第二十七《哀公问》英译])
Chapter VIII	Third Discourse: The Vision of a Social Order (《理想社会》[依《礼记·礼运》英译])
Chapter IX	On Education (《论教育》[依《礼记·学记》英译])
Chapter X	On Music (《论音乐》[依《礼记·乐记》英译])
Chapter XI	Mencius (《孟子》[依《孟子·告子》英译])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着力探讨《孔子的智慧》第五章,即林所编译《论语》中的翻译策略。以下从译文与原文篇章结构和内容的对比,分析林的编译策略。

(一)对原文篇章结构的“叛逆”——重新编排《论语》篇章结构  
《论语》共有二十篇,512条,各篇均取开头的两个字作为篇名;而林则重新排列、选录了其中的203条,对源文本“根据思想性质予以重编”(林语堂,2004:107)。

\* [收稿日期]2007-12-13

[作者简介]王晨婕(1982-),女,浙江宁波人,浙江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表二(中文摘自黄嘉德译本)

1. 学而篇 2. 为政篇 3. 八佾篇 4. 里仁篇
5. 公冶长篇 6. 雍也篇 7. 述而篇 8. 泰伯篇
9. 子罕篇 10. 乡党篇 11. 先进篇 12. 颜渊篇
13. 子路篇 14. 宪问篇 15. 卫灵公篇 16. 季氏篇
17. 阳货篇 18. 微子篇 19. 子张篇 20. 尧曰篇
- I. Description of Confucius by Himself and others (夫子自述·旁人描述)
- II. The Emotional and Artistic Life of Confucius (孔子的感情与艺术生活)
- III. The Conversational Style(谈话风格)
- IV. The Johnsonian Touch(霸气)
- V. Wit and Wisdom(急智与智慧)
- VI. Humanism and True Manhood(人道精神与仁)
- VII. The Superior Man and The Inferior Man (君子与小人)
- VIII. The Mean as the Ideal Character and Types of Persons that Confucius Hated (中庸为理想 父子之所厌恶)
- IX. Government (论为政)
- X. On Education, Ritual and Poetry(论教育、礼与诗)

从上表可以发现,译文不仅在篇章数量上比原文有所减少,而且译文的篇名也根据内容和思想性质重新给予命名。值得一提的是第六篇的篇名: The Johnsonian Touch, 这里的 Johnsonian 所指的是个性鲜明、霸气十足的十六世纪英国著名的诗人、剧作家、评论家本·约翰逊(Ben Johnson),林在此把孔子与西方人熟知的人物作了类比。总体上,在经过重新编排的译本中,前五章都是关于孔子文化形象的塑造,而后五章均是具有代表性的孔子思想的精髓部分。显然,林在译本中着力刻画孔子的形象和强调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

另外在儒家思想的具体编排上,林也独具匠心。在此试举一例:在林译本的第六篇 Humanism and True Manhood(人道精神与仁)中林将《论语》中唯一出现两次的有关“恕”的两个条目(分别为 4.15、15.24)都编辑在以 The Golden Rule(黄金法则)为小标题之下,另加了 12.2、5.12 两个条目。试看:

原文:

12.2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5.12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于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4.15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

子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15.24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林译:

The Golden Rule:

Chung Kung asked about true manhood, and Confucius replied, “When the true man appears abroad, he feels as if he were receiving distinguished people, and when ruling over the people, he

feels as if he were worshipping God. What he does not want done unto himself, he does not do unto others. And so both in the state and in the home, people are satisfied.”

Tsekung said, “What I do not want others to do unto me, I do not want to do unto them.” Confucius said, “Ah Sze, you cannot do it.”

Confucius said, “Ah Ts'an, there is a central principle that runs through all my teachings.” “Yes,” said Tsekung. When Confucius left, the disciples asked Tsekung what he meant, and Tsekung replied, “It is just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or shu).”

Tsekung asked, “Is there one single word that can serve as a principle of conduct for life?” Confucius replied, “Perhaps the word ‘reciprocity’ (shu) will do. Do not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do not want others to do unto you.” (着重号由笔者所加)

林语堂选录《论语》中的 12.2 和 5.12 作为对儒家思想“恕”阐释的导入:12.2 和 5.12 中虽然没有出现“恕”字,但都是关于“恕”的重要解读,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我不欲人之加诸于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另外,林将这两点英译为:Do not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do not want others to do unto you. 等。首先,林用 The Golden Rule 作为小标题,很容易使得西方读者联想到他们所熟悉的《圣经》中的黄金法则;再者,Do not do unto others what you do not want others to do unto you. 可以看作是《圣经》中的黄金法则“Do 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to you”(“holy”)的否定式;Reciprocity(互惠原则)亦是基督教中的重要教义,林将其与儒家思想中的“恕”作类比。

## (二)对原文内容的“叛逆”——重新选录条目与增加评述和注释

如上文所述,林选录了 203 条编译,并且分别在译本的第六、七、八和十篇中增加了《礼记》和《孟子》的相关内容。另外林在译本中增加了为数不少的注释及其个人的评述。例如:译文第四篇的第一条目,原为《论语》第四篇里仁篇中的第七条:子曰:“观过,斯知仁矣。”林在将其英译成“Confucius said, ‘By looking at a man’s faults, you know the man’s character.’”之后,又在该页下方引用《礼记》中的相关论述给予此条详细的注释,诸如此类的注释在译文中大量出现,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就不一一列出。

尽管在《孔子的智慧》的导言部分,林语堂明确表示过,他本人尽量避免在翻译中加入译者的评论,但同时承认在翻译中国传统古籍时译者的评论,也即译者个人的解读必不可少。

例如:译本的第二篇第十四条原为《论语》第十一篇先进篇中的第十五条: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林译:(Tselu was playing the Seh, and) Confucius said, “How dare Ah Yu play such

atrocious music in my house!” The disciple then began to look down upon

Tselu and Confucius said, “Ah Yu has entered the hall, but he has not entered

the inner room.”

首先林补充增加了语境信息(Tselu was playing the Seh,

and),另外在该页下方,加入了他本人的评述:

The orthodox interpretation is that Tselu had made some progress in learning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us, but had not mastered them yet. I am inclined to think that Confucius meant that Tselu was playing only in the inner chamber, and that therefore it was not so unforgivable after all.

(比较权威的阐释是子路在学习儒家思想方面确实取得了进步,但是并未完全掌握。我倾向于认为孔子认为子路还没有真正掌握要领,因此这并不是不可饶恕的[笔者注])

### 三、翻译目的论对林译《论语》“叛逆”现象的解读

#### (一) 翻译目的论的贡献

德国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目的论(skopos theory)”的创立人威密尔和莱斯根据行为学的理论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是有目的的行为活动,而‘制约翻译过程的首要法则便是翻译行为的目的’”(Nord:2001,27)。威密尔(1989)宣称,目的论的一大贡献在于“增加了可供选择的翻译策略,替译者松了绑,让他们不必局限于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因而常常是毫无意义的直译”(转引自张南峰,2004:115),因而为特定语境下“增补”、“删减”、“调整”甚至“改写”原文的某些成分提供了理论依据。与传统“等值观”相比,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是否对等而是强调译文应从其预期功能出发,根据各语境因素,选择最佳处理方法,因而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陈小慰,2000:10)。基于这个动态的评价标准,译者有权根据翻译的目的和要求采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对原文信息进行有选择的加工处理。因此对译文的评价,首先应分析译者不得不遵循的翻译目的,然后应该审视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是否有助于满足翻译的目的。

#### (二) 从目的论视角对林译《论语》的解读

正如翻译目的论所揭示的那样,翻译是人为的活动,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整个过程中,必然要考虑希望达成的目的,而且所做的任何决定也必然要以目的的实现在为主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下半期到六十年代的上半期,林语堂主要生活在海外,在这期间他创作翻译了一系列日后闻名于世的优秀作品。与其同时代的译家相比,林在这一阶段的翻译颇具特色:由于特定的历史和时代环境的原因,大多中国近代的翻译家致力于将外国作品大量译介到中国,以达到开启明智的目的;就在这轰轰烈烈的西学东渐大潮中,林语堂则反其道而行之,从最初积极投身的“欧化”运动转向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译介了一系列的文学作品和中国典籍。“今天,我们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活动,不难发现林氏带有明确的翻译目的,其翻译活动除受到译者主观因素影响外,还受到诸如社会环境、翻译发起人和赞助人等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卞建华,2005)。换句话说,除却译者的翻译观和翻译动机影响翻译活动(主要是指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外,制约翻译目的的客观因素可以有译入语社会环境和翻译发起者等。下面就从这些“背后的因素”解读林编译《论语》在内容和篇章结构方面的“不忠”的原因。

林语堂的翻译观集中体现在《论翻译》一文中,“他反对字译,提倡句译,提出译者应遵从‘寻常作文之心理’的观点,认为译者无字字对译之必要,且字字对译是不可能之事”(卞建华,2005)。他

十分赞同克罗奇(Croce)的观点,认为“凡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不能译的”,只可重作,译文即译者的创造品。林向西方译介的大多是古典哲学、散文以及诗词等难度较高的作品,无疑是受到上述翻译观的影响;另外他没有选择诸如所谓的“汉学家”的学院式翻译模式,即面向源语文本的策略,而是另辟蹊径,大众化地、通俗地译介中国传统文化,并且重塑了许多在西方人头脑中业已定格的中国经典形象。林语堂的翻译观直接影响他的翻译目的,因此他有选择、有策略地向西方读者译介了具有代表性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他认为撰写《孔子的智慧》,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外国人,为理想而写作”(施建伟,1992:39)。在《孔子的智慧》一书的导言部分,林语堂便作过这样的论述“谁也不可能只靠读《论语》一部书,而对孔子思想发展全面一贯的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从儒家经典及《四书》中选出若干章节来,因为这些章代表前后连贯的思想,而这些文章是前后一个系统的,是集中于一个主题的”(林语堂,2004:23)。由于“《论语》本文是属于零星断片而飞跳飘忽的风格”(林语堂,2004:106),因此若采用直译,译本无法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既而影响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效果。正是基于这样的翻译动机,林在整体上采取了编译的翻译策略,并在内容编排上增加了与所编译《论语》条目相关的《礼记》、《孟子》的内容以及他个人的评述,以此向西方读者更好地介绍儒家思想和重塑孔子形象。

除却林语堂个人的翻译观和翻译动机外,社会环境、翻译发起人和赞助人等诸多客观因素制约着他的翻译目的。《孔子的智慧》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初到意大利时,受到蓝登书屋之约,为其“现代丛书”(此套丛书规格很高,只出版名家名作)所编写。“在林语堂所处的时代,大多数西方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情况有隔膜,不甚了解,他们头脑里有关中国的知识,大部分是被歪曲和变形的东西”(卞建华,2005)。一些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的西方人凭一己之见,回国后以“中国通”自居,为了满足其本土读者海外猎奇的心理而著书立说,书的内容大多是对中国的丑化或所谓的“披露”。另一方面,当时“生活在高度工业化社会中的现代西方人,被飞速的生活节奏压得透不过气来”(施建伟,1999:351,393)。当时西方的社会环境以及出版社的商业目的影响林的翻译目的,既而影响他的翻译行为。林认为:“西方人若研究儒家思想及其基本的信念,他们会了解中国的国情民俗,会受益不浅的”(林语堂,2004:2)。同时为了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利话语,在《论语》一章的介绍部分,林着力刻画孔子的人品性格、语言之美等,甚至将《论语》之美与英国十八世纪包绥艾(Boswell)所写的《约翰逊传》一书的语言之美作类比,并对两人个性也作了类比:“至于武断偏执也有其动人的力量,孔夫子与约翰逊的武断偏执之论,永远有动人的力量,因为这两位先哲把自己的见解都表现得那么断然无疑,那么坚定有力,其势堪称咄咄逼人”(林语堂,2004:105)。因此亦不难理解,林所编译《论语》的第四篇的篇名为 The Johnsonian Touch(霸气)(见表二),他用西方人熟知的人物形象来与孔子作“类比”,其目的在于让当时的西方人更好地接受和理解孔子和儒家思想;另外林之所以采取编译的形式,对《论语》原文的重新编排与选录,毫无疑问考虑到译文接受者的情况,在该书导言部分,他明确意识到“西方人读《论语》而研究儒家思想时,最大的困难是在于西方的

读书习惯。他们要求的是接连不断的讲述,作者要一直说下去,他们听着才满意。像由全书中摘取一行一句,用一两天不断去思索,在头脑中体会消化,再由自己的反省与经验去证实,他么根本不肯这样”(林语堂,2004:23)同样,《圣经》中黄金法则在编译《论语》中的套用,亦是减少译入语读者的理解困难。林对《论语》原文的重新选材非常慎重。由于深知英语读者的需要以及西方文明所缺少的中国古典的人文情怀,因此在编译过程中,他选取特别能表现孔子幽默、大度、富于智慧的章节,竭力塑造了一个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中封建教条主义桎梏的新孔子。“林语堂顺应了社会环境的需要,在译介中国文化时,他所选择的文本基本符合西方文化的各种规范,能够满足当时西方人的文化心理需求,并采取了相应的变通手段和策略”(卞建华,2005)。林语堂编译的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深受西方读者的喜爱,1938 年出版后,《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上便发表了评论:“这位充满智慧的东方先哲的经典箴言名句至今都未过时,因为这些跟我们的生活有关就如它们曾经跟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有关联一样(笔者译)。”该书还曾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十名。

由此可见,摒弃传统“等值”观的翻译目的论为译文评价提供了动态的标准,即将译本是否有效实现翻译目的为尺度。林的有意“叛逆”是基于一定的翻译目的,不仅包含他个人的翻译观和翻译动机的影响,还受到译入语社会环境和翻译发起者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翻译目的论为林英译《论语》中的“叛逆”行为作出了合理解释,同时林的“叛逆”行为是为实现其翻译目的所作出的选择。

#### [注 释]

林原文:For dogmatism has its charm, and one is always impressed by the dogmatic judgments of Confucius and of Dr. Johnson because they both pronounced their judgments with so much force and self-assurance.

林原文:But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for a Western reader in approaching the system of Confucian thought through the Analects lies in the Western reader's habit of read-

ing. He demands a connected discourse, and is content to listen while he expects the writer to talk on and on.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reading a line out of a book and taking a day or two to think about it, to chew and digest it mentally and have it verified by one's own reflections and experience.

《纽约时报》原文:the aphorisms and discourses of this wise man of the East are as fresh today, as pertinent to our life, .....as they were to the people of ancient China.

#### [参考文献]

- [1] Holy Bible. 22 November 2007. [http://www.holybible.or.kr/BIBLE\\_cgb/cgi/bibleftxt.php?VR=1&CI=10758&CV=99&FR=H](http://www.holybible.or.kr/BIBLE_cgb/cgi/bibleftxt.php?VR=1&CI=10758&CV=99&FR=H).
- [2] Lin Yutang.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Lin Yutang [Z]. New York: Carlton House, 1938.
- [3] *New York Times*, Apr 20, 1938 (page 19) [N]. 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 *The New York Times* (1851 - 2001) [DB/OL], accessed on November 22<sup>nd</sup>, 2007.
- [4] 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5] 卞建华. 对林语堂“文化变译”的再思考[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2): 41 - 42.
- [6] 陈小慰. 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新思考[J]. 中国翻译, 2000, (4): 9 - 12.
- [7] 林语堂(黄嘉德译). *孔子的智慧* [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8] 施建伟. *林语堂在海外* [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
- [9] 施建伟. *林语堂传* [M].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9.
- [10] 张南峰. *中西译学批评*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杨 睿)

## Interpretation of treason in Lin Yutang's English - translated *The Analects by Confucius* from Skopos Theory

WANG Chen - 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Zhejiang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Lin Yutang's English - translated *The Analects by Confucius* on treas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structure and contents, and Skopos Theory is used to reveal the factors behind the treaso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The Analects by Confucius*, Lin Yutang, in purpose, used compiled translation method to realign the original structure and to add or delete the contents. Under special historic background, he popularly introduced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 ideas and molded the cultural image of Confucius.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treason i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can be reasonably interpreted from the angle of Skopos Theory, that the treason of the translator is the choice for reaching the goal of the translation and that the standard for evaluating the translated works depends on whether the translation attains the objective of the translation.

**Key words:** *The Analects by Confucius*; Skopos Theory; compiled translation